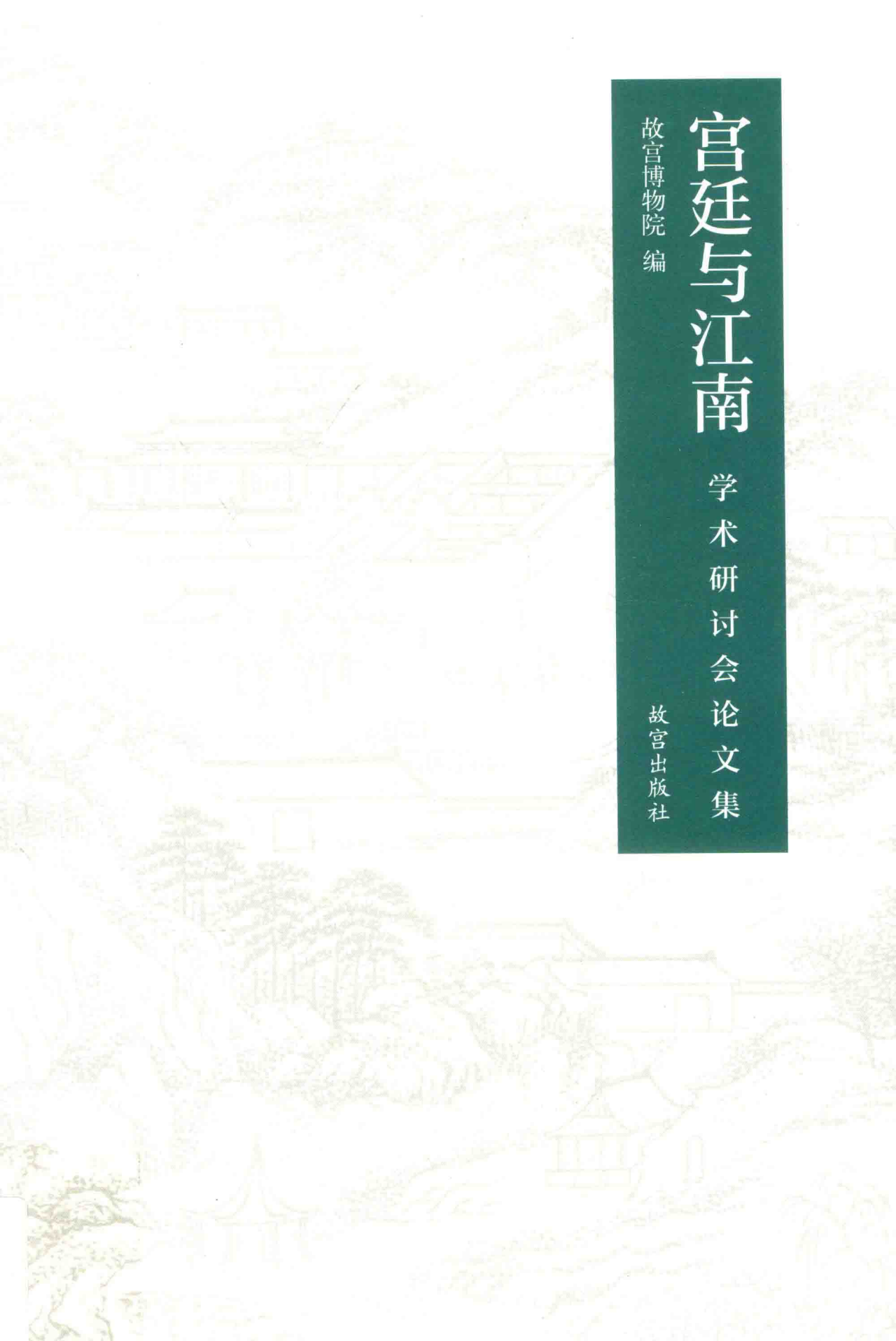




宫廷与江南

故宫博物院 编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故宫出版社

宫廷与江南

故宫博物院 编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故宫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宫廷与江南”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故宫博物院编.
——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34-0775-5

I. ①宫… II. ①故… III. ①文物-苏州市-明清时代-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872.53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6985 号

“宫廷与江南”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故宫博物院编

主 编: 章宏伟 王卫平 余同元

副 主 编: 陈 瑞 陶晓珊

出 版 人: 王亚民

责任编辑: 伍容萱 刘瑞溪

封面设计: 王 梓

责任印制: 马静波 常晓辉

出版发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 4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网址: www.culturefc.cn 邮箱: ggcb@culturefc.cn

制 版: 保定市万方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0

字 数: 5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134-0775-5

定 价: 116.00 元

序言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与丝绸之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的北端，连着北京，连着紫禁城，连着宫廷；大运河的南端，连着南方，连着江南。一条运河，将宫廷与江南串联起来，一个是政治中心，一个是经济与文化中心。宫廷与江南的联系，也主要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补与交流。

中国的经济中心，从安史之乱后就逐渐转向南方，到了宋室南渡以后，不止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随之转向南方。在这一转移过程中，位于江南的八府一州（苏州、松江、常州、江宁、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州），逐渐凸显出来。及至元明清三朝，江南已完全是全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明成祖迁都北京，修建紫禁城，使中国的政治中心重新回到北方，这就造成了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的分离。明清两朝，宫廷与江南的交流，就是对这种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错位现象的不断调适。

从政治层面来讲，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把南京作为陪都。终明朝一代，南京一直保持着一套与北京一样的中央管理部门，六部九卿科道诸官，一应俱全。南京作为全国的行政副中心，以江南作为后方基地，在政治上与北京相互呼应。李自成攻陷北京，南京方面很快就组建起新的弘光政权，陪都的作用，不可谓不明显。进入清朝，南京改称江宁，失去了陪都的地位，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在人们心中的既有影响，还是发挥着行政副中心的功能。清朝在江宁驻扎八旗重兵，康乾两帝每次下江南，都会到此检阅八旗劲旅，以武力为震慑，强调对江南及整个南方的控制。总的看来，明清两朝，地处江南的南京，实际上起到了全国政治副中心的作用。宫廷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与江南的联系非常密切，对其的控制也非常严格，非常高效。

从经济层面来看，江南是鱼米之乡，是丝绸之府，是全国手工业最发达，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另外，江南也是全国的赋税重地，每年从江南通过运河运往北京的

漕粮，构成了明清两朝政府机关顺利运转的经济基础。从宫廷经济来说，明清两朝在江宁、苏州、杭州等地设立的织造官员，就是直接为皇帝及宫廷服务的，在其他地区，远没有这么集中。这也充分说明江南之富庶及与宫廷对江南经济的依赖程度之深。

从文化角度来说，江南文化与宫廷的交流，可从以下两个例子反映出来。第一个例子是，明成祖营建北京紫禁城时，规制完全仿自南京紫禁城，除从江南征收物料外，还从江南征调了大批工匠，很多人在工程结束后就定居北京，继续为皇家服务，这批人成为沟通江南文化与宫廷的天然桥梁。明清两朝，江南是全国科举考试最发达，进士最集中的地区，特别是苏州，是各府州里出状元最多的，占了明清两朝全部状元的近三分之一。这些江南士子步入仕途后，大多会留在皇帝身边，成为文官系统中最重要官员。他们在朝为官，将江南的文化带入朝中，在皇帝身边形成浓厚的江南文化氛围。在这些“南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宫廷的各个方面充满了江南气息。说直白点：紫禁城里的一切，从物质的到非物质的，再到人，都与江南脱不开干系。

物质方面的，从皇家的衣食住行，再到文化娱乐，无不与江南有关。衣的方面，江南三织造为紫禁城提供了最好的丝绸；饮食方面，苏州香米、鲥鱼、西湖龙井、碧螺春茶、枇杷果等等，在宫中掀起了经久的江南风味，苏宴的出现，更是皇家饮食受苏州影响的直接产物；居住方面，江南园林对紫禁城中各大花园的影响，对圆明园、颐和园等园林的影响，有目共睹，苏州制造的金砖，今天还铺设在紫禁城的主要宫殿之内；出行方面，紫禁城因条件所限，不能乘船，可在西苑三海、三山五园，皇家游船都是模仿江南式样。江南刻印的书籍，因刻工精美，在紫禁城中一直最受欢迎。其他如江南的玉器、雕漆、刺绣、钟表、文房用品等，无一不受紫禁城中的欢迎。康乾二帝十二次下江南，为江南的山水与文化所陶醉，每次都会流连忘返。

非物质方面的，苏州的香山工匠帮，从建造紫禁城时起，就是紫禁城建筑的一支最重要的维护力量；苏州的吴门画派，曾改变了清宫画院的绘画风格；起源于江南的昆腔，在道光咸丰以前，一直是紫禁城中流行的剧种；苏州手工业工匠的高超技艺，细腻入微的风格，让紫禁城中的皇帝甚为倾倒，经常把造办处不能生产的东西交给苏州工匠来做，这就是著名的“苏工”。故宫博物院前几年倦勤斋修复工程中的“双面绣”工艺就出自苏州。

江南与宫廷有着这么深厚的渊源，有鉴于此，2012年11月，故宫博物院联合苏州大学召开了宫廷与江南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举办得非常成功，故宫学研究所精选一部分论文，编成这部《宫廷与江南》出版。这部书的出版，一定会推进宫廷与江南学术的深入开展，推进故宫博物院与苏州市政府的进一步合作，促进两者协同发展，共同进步。



目录

朝廷政治与宫廷生活中的江南

——兼论明清宫廷生活中的苏州之韵

余同元 / 1

康乾盛世与江南商品经济发展探微

朱诚如 / 35

康熙乾隆皇帝南巡苏州及其在苏州的政务活动述略

霍 聃 / 42

民间话语中的康熙南巡

——读《圣祖五巡江南恭录》

刘 潞 / 55

乾隆第四次南巡皇后乌拉纳喇氏遣返考

吴十洲 / 68

从台湾故宫所藏几份奏折看清中后期政府对会馆监管的加强

王日根 / 77

明清时期中央朝廷与地方关系中的江南著姓望族

吴仁安 / 86

明清江南的食物贡奉

裘晓强 / 110

王鏊所记明代内阁丝纶簿

吴建华 / 125

嘉庆整顿江苏钱粮亏空述论

张玉芬 / 138

从刘世延案看明末南京的治安管理与司法制度

罗晓翔 / 146

乾嘉时期江南盐商与清代帝后万寿

滕德永 / 163

试论清代长洲彭氏士绅经营宗族事务的活动及其意义

沈 欣 / 174

公元 13 至 15 世纪中国北方官式建筑与江南营造

徐怡涛 / 185

“龙井新茶龙井泉，一家风味称烹煎”

——乾隆皇帝与龙井贡茶

黄 英 / 194

江南“三织造”与清宫盔甲制作

毛宪民 / 217

“苏式”家具对清宫家具的影响探论

周京南 / 229

清代苏州织造与苏州市民生活

沈慧瑛 何 伟 / 242

关于清代婺源籍苏州墨工身份的认定

——以故宫藏吴玉山墨为例

林 欢 / 250

明清金砖款识考辨

——基于新发现 100 份金砖拓片的分析

黄鸿山 王卫平 / 259

明清时期金砖的烧制流程和工艺研究

王 晗 / 268

明清江南工匠入仕与技术进宫

——《传统工匠现代转型研究》释读

何 伟 / 280

江南民众佛教信仰与五台山方册藏刊刻

——以《嘉兴藏》施刻文为中心的考察

章宏伟 / 290

宫廷与苏州的交融

——以乾隆时期清宫和苏州的玉器雕刻为考察对象

郭福祥 / 316

嘉定竹刻：明清江南的地域环境与社会生活

冯贤亮 / 344

近世江南张老相公信仰的发生及变迁

朱海滨 / 367

仿佛江南一段秋

——乾隆珐琅彩瓷中的江南意韵

孙 悦 / 379

故宫博物院藏青田石印述论

恽丽梅 / 389

吴山涛与禹之鼎

——江南画家与宫廷画家的一次聚会

任 昉 / 401

论扬州诗局设立的原因与影响

鲁 颖 / 407

从传统“琴谱”的形成与发展谈及故宫藏谱《秋鸿》的情况

李 村 / 418

从清代内务府档案记载看“苏州”工艺在宫廷的特点与地位

苑洪琪 / 426

宫廷建筑与江南营造

黄希明 / 436

赵弘恩其人及其督治两江史实考述

——兼析雍正“帝官实政令”的江南命运

蒋明宏 / 450

清宫礼仪的再现

——论《翁同龢日记》的戏曲史料价值

黄 卉 / 461

朝廷政治与宫廷生活中的江南

——兼论明清宫廷生活中的苏州之韵

余同元 苏州大学

邹逸麟先生《谈历史上“江南”地域概念的政治含义》^{〔1〕}一文指出，江南地区历代政治地位变迁，明代中叶后，江南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士绅阶层地位上升，市民意识加强，参政意识强烈，舆论影响增大，如晚明东林学派、复社成员，或科举为官，或经商富贵，两者结合，士商合一，形成一股社会势力，或与朝廷政策对立，或干预地方事务，实质是反专制反封建的。因此，明代中央政权对这一地区产生先天忌恨，满清入关后也对江南特别头痛，故统治者更加关注江南的控制和经营。这些论述为江南与宫廷关系史研究指明了方向。2011年11月，笔者在北京故宫学讨论会宣读《明清宫廷与江南的历史文化互动》^{〔2〕}一文，认为故宫学要特别研究宫廷与江南的历史文化互动，并强调这种来自江南的，包含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宫廷文化，既有南北两京或南方北方区域空间异质性互动，又有朝野或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层级互动，更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和风俗信仰等要素的区域时空互动与互溶性质。随着历史发展，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也向前发展，一般都表现为政治权力、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和从下至上（从地方到中央）的双向互动。本文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并重点论述明清江南战略地位与地缘结构变化，以及这个变化过程中宫廷与江南互动的空间障碍如何协调。

〔1〕 邹逸麟：《谈历史上“江南”地域概念的政治含义》，《浙江学刊》2010年第2期。

〔2〕 余同元：《明清宫廷与江南的历史文化互动》，2011年11月10日提交北京故宫学学术研讨会宣读，并被收入大会论文集。

一 明清江南战略地位与地缘结构的变化

（一）西北中国到东南中国区位变局下的“战略江南”

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与顺治皇帝所说“万里江山一局棋”相近。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说明中国自古有着东南沿海区域和西北内地区域的地缘差别。宋元以前，西北中国是前庭，东南中国是后院。明代中后期“边禁”、“银禁”与“海禁”开放以后，东南中国由后院变成前庭，中国地缘战略开始发生近代转型。^{〔1〕}所谓明清“大变局”就是指东南中国与西北中国的战略地位发生巨大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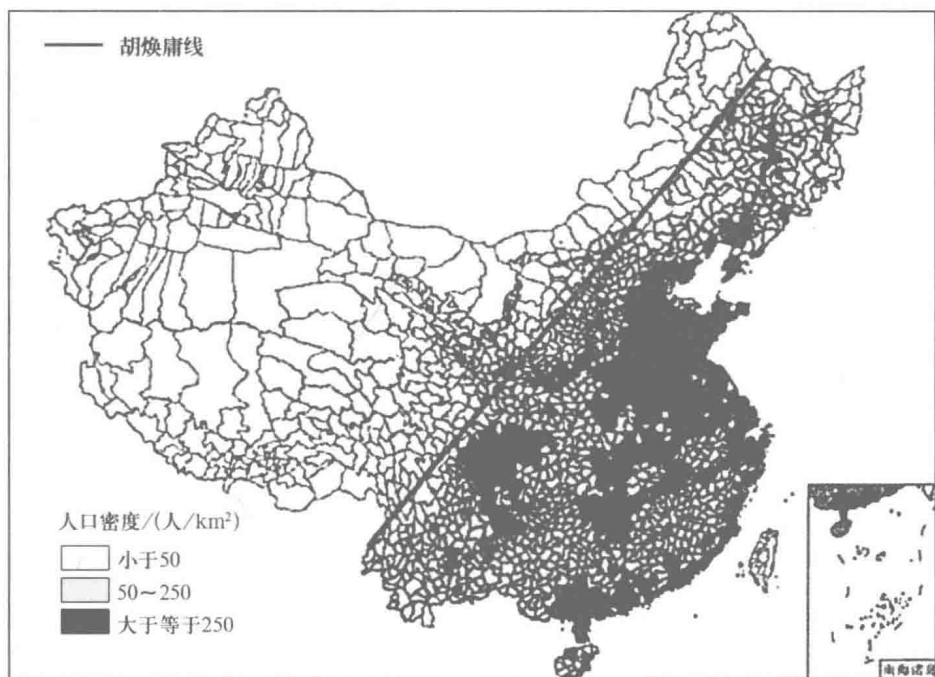
中国版图兼有南农、北牧两大区域，历代长城内外的对峙，农、牧民族的分合，正是人类历史上农、牧世界二元一体化进程的历史缩影。自秦汉至宋元，中国边防主要在北边。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大庭院，宋元以前这个院子的大门朝北开，因为影响中国农业民族的主要因素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历代封建王朝所谓的“边防”主要指万里长城沿线的防御情况，其内容包括北部的边患和战略、边防的部署和长城的修筑与驻兵守御等方面，形成了著名的长城文化带。^{〔2〕}但至明初，开始构筑海防体系，永乐至宣德年间进一步完善海防设施。海上的防线由水军担任，陆上防线由各卫所的陆军和巡检司担任。各卫所负责防守一定的海区 and 地域，并互相呼应。这样，在沿海构成了基本完整的，有一定纵深和层次的防御体系。中国东南海防地位日益重要，迅速上升并超过西北边防。

现代地理学家以黑龙江漠河到云南腾冲为两端，在中国地图上划一斜线，称“胡焕庸线”（图一），斜线以西以北为西北中国，拥有占中国领土面积 60% 左右的土地和占总人口数 5% 的人口，大体上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或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斜线以东以南为东南中国，拥有占领土面积 40% 左右的土地和占总人口数 95% 的人口，基本上是历史上农耕民族（汉族）的主要活动区。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曰：

〔1〕 余同元：《明清社会近代转型及转型障碍》，《江南大学学报》2011 年第 5 期。此文章同时被《新华文摘》2012 年第 3 期第 161 页摘要介绍。

〔2〕 余同元：《中国长城文化带的演变》。载于《崇祯十七年》，第 477—484 页，台湾老古出版社，2002 年。



图一 胡焕庸人口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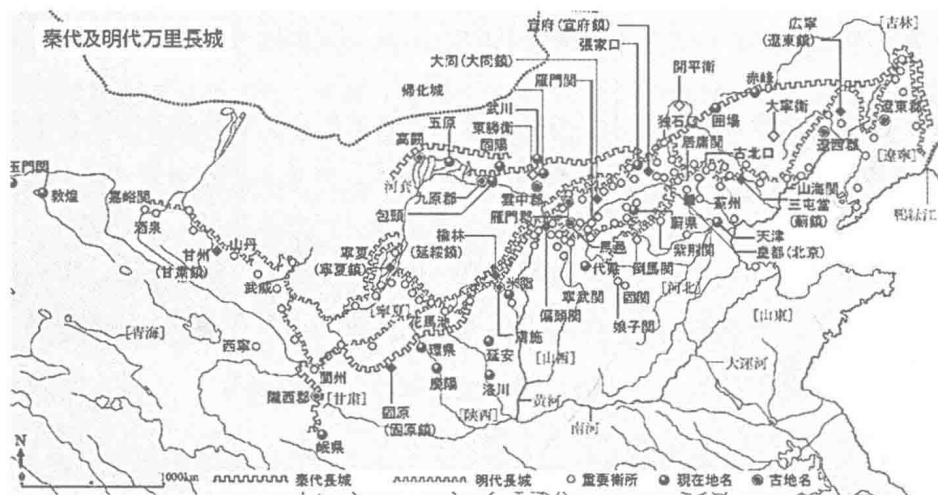
以东南之形势而能与天下相权衡者，江南而已。春秋时勾吴实雄长于东南，以兵威破楚、臣越、败齐，又闕深沟於商鲁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当是时，微越之故，吴且霸天下。……或者曰：明太祖以江南而奄有中原，为千古创见之局。此实不然，从来建事功者，得失虽殊，成亏或异，而其能法非以有为则一也。楚南公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故西北与东南恒有互为屈伸之理。^{〔1〕}

之所以长期出现东南中国与西北中国这种二元区域双轨发展的局面，是因为中国是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打开世界地图，由东起东北亚的大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格罗斯山、高加索山，向西直至欧洲境内的喀尔巴阡山划一横线，将亚欧大陆区划为两部分：横线以南多为湿润的平原森林地带，宜农耕，其中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东亚的黄河长江流域、印度的恒河流

〔1〕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九，《续修四库全书》第60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域等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农耕中心。横线以北多为干燥的高原荒漠地区，与农耕地带平行，东起西伯利亚经中国东北蒙古高原、中亚、咸海、里海以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带，其核心地区是蒙古高原至中亚一带。农牧分界线划分的方法略有不同，台湾三民书局1982年版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国》以亚洲东北部的堪察加半岛尖端与阿拉伯半岛西端相连接划一直线。台湾“中央”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札奇斯钦《蒙古文化概说》云：“自东北亚洲大陆的嫩江、松花江流域，沿长城线，经西藏高原，伸向阿拉伯半岛划一条线。”这条线正好横穿中国，将中国分为西北中国和东南中国两部分。

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之间的分界线时有迁移，与历代长城位置的移动基本同步，反映了自然的农、牧过渡带与人文的长城文化带的变迁特点。^{〔1〕}明代长城文化带进一步南移（图二），农牧民族二元一体化进程加速，到隆庆五年“俺答封贡”，边禁开放，长城文化带由“内边疆”形态变成了农牧民族贸易带和农牧文化融合带，到清代实现边疆、内地社会一体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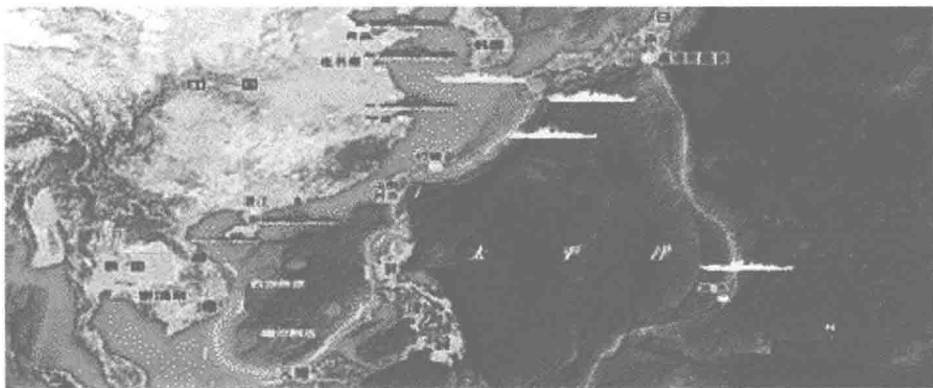
图二 秦代及明代万里长城图

〔1〕 余同元：《明代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与演变》，《烟台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同时被人民大学《明清史》1990年第8期全文转载。

〔2〕 余同元：《中国历史时期农牧民族二元一体化发展》，《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同时被《新华文摘》1999年第10期摘要介绍。

《汉书·天文志》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近代中国社会的开放性源头来自沿海的东南中国。明清社会的开放，最先是在东南沿海登陆，其后在全国引发政治、经济、文化大变动。

15 世纪中后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封建主和寺院大地主为扩充实力，弥补内战损失，怂恿、支持海盗活动，因而倭寇逐渐猖獗。到 16 世纪，倭寇与明朝沿海走私商结合，窜犯今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占据岛屿，攻城掠地。倭寇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给沿海民众带来巨大灾难，威胁明朝海防。嘉靖二十五年开始，明政府全面整治海防。（图三）编绘了《筹海图编》的郑若曾又编绘《长江防御图》与《太湖防御图》。他写出《江南经略》，包括 46 幅《江防图》和 29 幅《湖防图》，这些地图是明代江南江河湖泊战备图的代表。其中所绘《江防图》的范围主要为长江下游，西起今江西瑞昌县沿江而下，东到长江口金山卫，整个范围是倭寇进犯可能到达之地。图上重点描述江防设施、哨所驻地、各营防区范围及其界线、倭寇出没路线等。图上注记文字较多，除了地名、山名、港名、寺名之外，还标注了防区的起止地点，不同巡司距离，巡逻水军兵员多少、舰只数量、巡逻周期等。太湖是倭寇水路进犯之地，《江南经略》特绘制《湖防图》，有《太湖全图》和《太湖沿边设备之图》29 幅，分别描绘了太湖和沿太湖周边港、渚 250 余处及其防备情况。



图三 明代万里海防图（局部）

16 世纪初，欧洲殖民势力开始东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相继来到中国。嘉靖二年葡萄牙人米儿丁·甫思多灭儿带兵到广东沿海，企图用武力打开通商大门。嘉靖二十八年明军在浙江巡抚朱纨、副使柯乔、都司卢镗等人的率领下，重

创侵占福建诏安马溪的葡萄牙海盗。同年荷兰殖民者侵略澎湖失败。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占据澳门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势力相继来华。天启二年到四年，荷印总督率军犯澳门和澎湖均被明军击败，其后荷军占领台湾。嘉靖中期至万历中期，在海防发展的基础上还出现了很多海防理论著作，除《筹海图编》外，还有《筹海重编》、《虔台倭纂》、《皇明海防纂要》等。自海防地位日益提升，中国地缘战略发生整体转型，过去作为后院的东南沿海地区，现在变成了中国的前庭门户。从此，中国边防与海防地位此重彼轻或轻重难分，导致战略抉择困难重重。直到19世纪中后期，清朝东南海疆、西北边疆又同时危机，引发了清廷内部半年之久的出海防与塞防轻重缓急之争。

综观明清西北边防与东南海防关系史，发生了多重的变化。

一是前庭与后院的关系：明清时期东南沿海由后院变为前庭和门户。

二是陆权与海权的关系：郑和下西洋、皇明筹海、海权时代开启。

三是守成与开拓的关系：洋防与岸防，战略防守与战略出击。

四是守内与御外的关系：明代防人与清代防出。

五是重中之急与急中之重的关系：晚清塞防与海防之争。

（二）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下的“财富江南”

中国之一统，多指南、北方之统一。统一国家大多定都于北方之北京，而以南方之南京为陪都，形成一个南北向的政治、经济、文化轴心带，这是经济中心南移导致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带变换之大势。唐宋元以降，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了，政治中心却不能随之南迁，统一王朝由西向东，由长安而洛阳而开封而北京逐渐移动，可以出现以北京为主、南京为辅的两京制度，而却难以出现以北京为辅、南京为主的两京局面。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历代统一王朝时期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现象。

北宋末，赵构重建宋室社稷，李纲建议：“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宋史纪事本末》卷六〇《李纲辅政》）后来，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汪若海对张浚说：“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八《张浚经略关陕》）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局面中，有两次是以关中为基础完成统一的。秦汉和隋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关中向西北层层渐高的梯级地势，给历代经营西

北者显示出了一个层层递推的逻辑：欲保关中之安全，必须控制陇西；欲控制陇西，必须控制河西；欲控制河西，必须抚定西域。

清代学者赵翼曰：

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秦中自古为帝王州，周、秦、西汉递都之；苻秦、姚秦、西魏、后周，相间割据；隋文帝迁都于龙首山下，距故城仅二十余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统。唐因之，至开元、天宝而长安之盛极矣。盛极必衰，理固然也。是时地气将自西北趋东，此正地气自西趋东北之真消息，特以气虽东北趋而尚未尽结，故仅有幽、蓟而不能统一中原。而气之东北趋者，则有洛阳、汴梁为之迤通潜引，如堪舆家所谓过峡者。至一二百年而东北之气积而益固，于是金元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扩西北塞外数万里，皆控制于东北，此王气全集于东北之明证也。而抑知转移关键，乃在开元、天宝时哉？^{〔1〕}

唐代出现“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但整个政治重心不离北方长城一线，所谓“大变局”仍然是不变中的小变。明代中后期，开始出现自西北中国转向东南中国之“大变局”，才真正标志着中国地缘战略的大转型。明清时期，不仅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皆移至江南，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海上侵略势力的到来和东南海防的日益重要，国家战略重心向东南转移。对此，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篇》提出了著名的“建都之问”，认为明清时期战略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首都应该建于南京而不是北京，这样才能使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统一起来：

或问：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围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江南之民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或曰：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

或曰：古之言形胜者，以关中为上，金陵不与焉，何也？

〔1〕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二〇《长安地气》，中华书局，1984年。

曰：时不同也。

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犹富室之有仓库匱篋也。今夫千金之子，其仓库匱篋必身亲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仆妾以仓库匱篋。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矣。

黄宗羲的观点是否正确？揆诸明清史实，“门庭”与“仓库”已然转型换位，建都的战略反思尤为必要。

第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还是统一？或者问为什么分离？

第二，政治中心是否随经济中心迁移？或问人臣能否替代天子守边？

第三，所谓“时不同”有哪些主要表现？“明清江南”地域特征何在？

第四，金陵能否重新成为首都之佳选？或者江南能否成为真正的政治中心？

第五，如何避免“贫极江南、富夸塞北”？如何处理中国前庭与后院之关系？

元代以江南地区为主要经济掠夺对象，导致《草木子·克谨篇》所说的“贫极江南，足实塞北，富极腹里”的极端不公现象。《元史·食货志》说京都“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在元中书省和九个行省中，江南三省（江浙、江西、湖广）每年所征税粮近六百五十万石，超过全国总数的二分之一，而江浙一省就征近四百五十万石，超过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元末农民义军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作为宣传口号，表达了江南人民对于民族掠夺的无比愤恨。至元二十年大小起义两百余处，至元二十六年增加到四百多处，几乎南方各地都有起义发生。

历史时期建立于东南的政权，有春秋时期的吴、越，三国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吴越，南宋、元末周（张士诚）、清太平天国等，皆是命短，更加说明中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长期性。明代学者李乐、张萱均有论说。“国朝定鼎金陵，本兴王之地，然江南形势终不能控制西北。”〔1〕“南京之形势跨江南北，以为甸服。岷峨以西，五岭以北，川流以万数，皆会于江，绕钟山而之海；岍岐之南，太华恒岳之间，川流亦以万数，皆会于河，入于淮、朝宗畿甸而之海。无事则坐享扬越之粟而无转输之劳，有事则席卷全吴之甲而为张皇

〔1〕李乐：《见闻杂记》卷一。载于《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上册，第1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之本，故正统间有建议南迁者。殊不知以天下大势观之，终不若燕京之胜，而今日都之诚是也。”^{〔1〕}

地理因素是影响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持久因素。人类军事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地关系，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特征。这方面研究称为地缘政治学或地缘战略学。明清江南格局变化自有其变化的时代背景和地缘机遇。美国海军少将马汉发表《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和《制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两书，创立了系统的海权学说，论证海洋拥有比陆地更优越的交通优势，控制海洋便可控制大陆。为了建立海上强权，一个国家的都城必须位于战略地理的中心位置，既有安全可靠的陆地边界，又有一个或数个进入公海的可靠通道；拥有深水港和利于防守的海岸，进可攻退可防；拥有一支在国内外均有作战基地的强大远洋海军，并以庞大的商业船队作为辅助力量。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边防的根本问题是保障陆权，海防的根本问题是发展海权。一旦边防危机与海防危机同时爆发，国家战略资源的有限性使其不能二者兼顾，必须正确处理保障陆权与发展海权的协调关系，即“不管战略宣称如何，总是从属于地缘政治的判断”。无论是从中国的《孙子兵法》还是西方的陆权、海权等战略理论看，地缘政治关系始终是战略地理学中至关重要的核心因素，所以说最大的战略就是地缘政治。

（三）闭关到国际开放中的“枢纽江南”

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了世界“地理中心（枢纽）”概念，也就是“世界岛”理论。即：谁统治了东欧平原，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全世界。如果将明清中国比作一个“孤岛”，那这个岛内的“心脏”无疑就是江南，即上文所谓的“中国的心房”。它的空间形态虽在南方，但它的政治、经济、文化要素早已开始国际化和全球化，并通过空间的层级的互动与北方的宫廷联为一体。整个明清时期，由于“海禁”政策时作时息，使江南的国际化进程受到较大影响。但自明中期“银禁”、“海禁”、“边禁”等“三禁开放”后，江南毕竟不同于以往，开始正式步入全球化与国际市场化轨道。

明初海禁（洪武到永乐）开始。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正式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标志着海禁作为明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正式确立。明成祖较大程

〔1〕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六二《兵部十一》，杭州古旧书店，1983年。